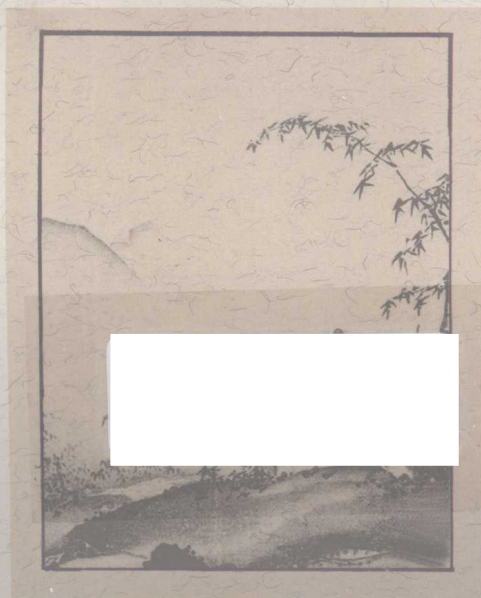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知识与抒情

宋代诗学研究

张 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知识与抒情

宋代诗学研究

张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 / 张健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5703-6

I. ①知… II. ①张… III. ①宋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4403 号

本书的相关研究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的资助(项目号:453407)

书 名 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张 健 著
责任编辑 徐 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70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s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20.5 印张 511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

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目 录

绪 论	1
一 知识与抒情	2
二 宋代诗学的知识转向及知识论述	7
三 重建抒情传统与抒情、知识关系的重构	12
第一章 重建文学的道德基础	17
一 礼乐崩坏与文化重建	17
二 苏轼的道统论述与“古文家”的思想史地位	25
三 文道关系的重建	36
四 “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黄庭坚关于道德、 学问与文学关系的论述	52
五 从“立身之道与文章异”到“文如其人”	68
第二章 审美重建与晋唐传统	76
一 对晚唐五代的审美批判:格韵卑浊	76
二 审美重建与晋唐精神	79
三 格与韵:新审美标准的确立	98
第三章 命意布置与书本事料	129
一 立意与命意:思想主题优先	131
二 命意与布置:意义的内在逻辑与叙述结构	141

三	从草木鸟兽为料到以事为料	157
第四章	句律精密与规模波澜	178
一	命意与句法	180
二	炼字	206
三	规模与波澜	228
第五章	浑成境界与昆体工夫	250
一	道德工夫与文章工夫	250
二	黄庭坚的工夫论述	252
三	工夫论之观念框架的转变及其再展开	261
第六章	文道关系的再调整:理学家的文道论述 ...	283
一	贯道与载道之辨:文学家与理学家的文道观	284
二	“有德者必有言”:理学家文道关系论述及其 经典基础	291
三	存养工夫:知识作为道德的基础	309
四	道统与文统的合与离	319
第七章	从言志到明理:诗歌的义理价值与知识 基础	330
一	分裂的诗歌观念:尊诗与贬诗	332
二	“雪月风花”与“天理流行”	349
三	“吟风弄月”与“曾点气象”	357
四	朱熹“以理为诗”及其《斋居感兴》的经典化	366
五	景物“把做道理看”与理语、理趣:理学家观物 方式的诗学影响	369

第八章 删后无诗与下学上达:理学家的诗歌史论及诗学工夫论	378
一 “自从删后原无诗”	378
二 朱松:汉魏晋与唐诗的高下	380
三 朱熹的三变说与尊古贬律	383
四 陆九渊述诗之源流	390
五 朱熹的学诗工夫论	393
第九章 回归唐诗与抒情传统的重建	405
一 朱弁:重建钟嵘的抒情论述	405
二 张戒:言志为本与咏物为工	411
三 “四灵”:回归唐诗传统与抒情传统的重建	419
四 叶适:“合周程、欧苏之裂”与尊唐崇律	435
五 晚唐体的流行及其批判	466
第十章 抒情传统的重建与价值格局的调整	471
一 “合周程、欧苏之裂”:理学与文学之分裂与融合	473
二 “洛学兴而诗律坏”与诗律重建	491
三 “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抒情与知识的对立与融合	504
四 尊古与崇律之间	517
五 本色与大家:多元价值标准的确立	523
六 功夫与路径	536
第十一章 以知识途径造抒情境界:重建抒情之道	542
一 四人论诗与当代诗学问题	543
二 严羽:“辨白是非,定其宗旨”与“以禅喻诗”	551
三 禅道与诗道:禅与诗的真理与价值问题	557

四 诗道的展开	567
五 诗道在妙悟	590
六 参诗与悟入:功夫与境界	600
附录 严羽与王埜、戴复古等论诗考	610
参考文献	625
作者小传	641

绪 论

严羽《沧浪诗话》论述宋诗,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到苏、黄“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再到四灵、江湖诗人“复就清苦之风”,“自谓之唐宗”。在严羽的论述中,整个宋诗史分为沿唐、变唐到复唐三个阶段。这一论述并非孤立特出。再看叶适的说法:“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①此“近岁学者”指四灵。按照叶适的论述,自北宋庆历、嘉祐开始贬黜唐诗传统,意味着庆历、嘉祐以前是继承唐人传统;随着庆历、嘉祐以来之贬黜唐诗传统,遂有江西宗派的兴起,背离唐诗传统;再到四灵,回归与重建唐诗传统。无论是叶适还是严羽,都从与唐诗传统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宋代诗歌史,将宋诗史看作是继承唐诗传统、背离唐诗传统到回归与重建唐诗传统的历史过程。这一诗歌史的演变过程所蕴含的诗学思想意义是什么?换句话说,这一变化过程的背后是什么诗学观念在起作用,或者说体现了什么诗学观念?明白此一问题,可以了解诗歌史背后的思想观念,而正是这背后的思想观念制约了历史的变化过程。

宋代诗歌史背后所蕴含的基本诗学思想问题是知识与抒情关系,叶适、严羽所说的宋代诗歌史三个阶段,从诗学思想层面上说,就是从继承抒情传统到建立知识传统再到重建抒

^① 《题刘潜夫南岳诗稿》,《水心文集》卷二十九。

情传统的过程。整个宋代诗歌史、诗学史的核心问题就是知识与抒情的关系。宋以后诗歌诗史大体就是宗唐或者宗宋的历史，而知识与抒情乃是贯穿始终的问题。

一、知识与抒情

清人王士禛从抒情与知识的关系角度论述诗歌之道，认为诗之原理有二，一是性情为中心，一是知识为根本，此两者在诗歌史中隐然成为两个并列甚至对立的传统。其《突星阁诗集序》云：

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①

根据王士禛的论述，诗之道有二：一是根柢，二是兴会。兴会发自性情，而根柢原于学问即知识。由于王士禛是在诗道即诗歌的基本原理层面上谈论问题，所以，此一论述就意味着诗歌的基本原理有二：一是以性情为基础，一是以知识为核心。这两者“率不可得兼”，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紧张的关系。但是，王士禛认为，这矛盾的两者并非绝对不能统一。他在此文中说，其所序诗集的作者王戩“于斯二者兼之”，统一了性情与知识两者。联系王士禛的其他论述看，王氏本人是主张两者统一的。他在回答门人关于性情与学问关系之问时说：

^① 《渔洋文》卷三。

司空表圣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扬子云云：“读千赋，则能赋。”此学问之说也。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①

此一段正可与上一节相参，上节揭示了性情与学问的矛盾，此段则强调两者的统一。“学力深始能见性情”，即是说诗歌的抒情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

由于王士禛是在诗道的层面上讨论，故我们可以说，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知识与抒情的关系问题。他不仅指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也提出了统一的问题。

王士禛的上述观点表面上看来是理论的论述，而非历史的叙述。但是，他的这一理论论述乃是从诗歌传统以及诗学传统中概括而出。在王士禛心目中，性情与学问、兴会与根柢两种类型的诗道体现在诗歌史上分别是唐诗与宋诗的传统。其选《唐诗三昧集》，理论依据就是司空图“味在酸咸之外”以及严羽“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的论述，而这就是他所谓的性情与兴会之道的内容。与之相对的，则是宋诗传统。王士禛在理论上讨论的抒情与知识的关系，在诗歌史上其实就是唐诗与宋诗传统的关系问题；他所提出的抒情与知识的统一在诗歌史层面上说即是唐宋诗传统的统一问题。王士禛的论述揭出了诗歌史及诗学思想史的大纲，即中国诗歌史及诗学思想史有两大传统：一是抒情传统，一是知识传统，而从唐到宋经历了一个由抒情为本到知识为本的转变，抒情传统与知识传统之间存在着矛盾紧张的关系，也面临着如何统一的问题。

王士禛有关抒情与知识问题的论述并非前无古人，横空而

^① 《诗问》，《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

出。上溯至宋代，刘克庄也有相关的论述，他在《跋何谦诗》中云：

余尝谓：以性情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①

所谓“性情礼义”出《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即合乎礼义的性情；“以鸟兽草木为料”，即以景物作为抒情的媒介，两项加起来就是写景抒情。这是“风人之诗”，即所谓“诗人之诗”。“以书为本”，显然是与“以性情礼义为本”相对，言其诗的根本是书本即知识；“以事为料”，与“以鸟兽草木为料”相对，说的是用事，以典故作为表现的媒介。前一种是性情为中心，后一类是知识为中心。而在刘克庄，唐诗是风人之诗，宋诗是文人之诗。他称“唐文人皆能诗”，“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他概括三百年间的宋诗“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②。根据刘克庄的论述，诗有二道，一是性情为本，一是知识为本；诗歌史有两个传统，一是抒情传统，一是知识传统，唐诗属于前者，宋诗属于后者。我们在本书相关章节中会论及，他指出了抒情与知识的矛盾，也提出了统一的问题。

与刘克庄同时，严羽提出“诗者，吟咏情性者也”，认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书、理都属于知识的范畴，严羽此一论断极其尖锐地突显了抒情与知识的紧张关系。他以盛唐为唐诗之代表，认为唐诗抒写性情，唯在兴趣；宋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不问兴致；唐宋诗属于两个互相对立的传统。他主张以盛唐为法，实际上就是要重建唐诗的抒情传统。但是，在严羽强调抒情与知识之紧张关系的同时，也承

① 《跋何谦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

② 《竹溪诗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

认知识对于抒情的重要作用：“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如何在读书、穷理的基础上重建唐诗的抒情传统，这是严羽面临和处理的重大诗学理论问题。

从刘克庄、严羽到王士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倾向，他们都把诗歌史上的唐宋诗之辨看作是诗学思想上的抒情与知识的关系问题。

抒情与知识的关系是中国诗歌史、诗学思想史内部的重要命题。从诗学思想史的角度，有关的论述可以上溯到陆机。《文赋》说“颐情志于典坟”，典坟是经典，诗歌所抒写的是诗人的情志，但诗人的情志是要以经典知识来涵养的。《文赋》所论虽含各种文体，但此以情志为言，所指的显然主要是抒情言志的诗歌。陆机从作者的角度提出了以知识颐养情志的问题。钟嵘则从表现方式的角度提出了抒情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诗品》说“至乎吟咏情性也，亦何贵于用事”，认为诗歌是抒情的，不应崇尚用事。用事基于知识，因而钟嵘所提出的乃是抒情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依钟嵘的论述，诗人的情感是由当下的景物、人事引发的，即所谓“感物”，诗人抒情，写当下引发情感的景物、人事即可，而不需要借助历史典故来抒情，这种主张用钟嵘自己的话说即是“即目”“直寻”，而不是“补假”。钟嵘揭示了抒情与知识之间关系紧张的一面。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①这两句诗本来是杜甫自述，读书万卷是一事，下笔有神是一事，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杜甫本人并没有明确的表示。但宋人却视此二句间有因果关系，读书万卷是因，下笔有神是果，并且将之上升为诗歌原理，要下笔有神，必须读书万卷。这一命题肯定了诗人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

钟嵘与杜甫二人提出截然不同的命题。这两个命题在今

^①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

天看来也许并不矛盾。钟嵘的论述是就表现方式说，而杜甫的命题是就诗人修养言，从理论上讲，可以读书破万卷，而在表现上又不贵用事。但是，就钟嵘的命题论，如果用事并非必要，那么对于诗人来说，广博的知识就没有必要性。陈衍深明此中关系：

余所以雅不喜《诗品》者，以其不学无识，所知者批风抹月，与夫秋士能悲、春女能怨之作耳。力诋博物，导人以束书不观，不免贻误后生，至雌黄颠倒，犹其次也。夫作诗固不贵掉书袋，而博物则恶可已？^①

在此段论述中，陈衍认为，钟嵘只知写物抒情，却“力诋博物”。博物，即博知众物，具有广博的知识。事实上钟嵘论述中只是反对用事，并没有明确反对博物；陈衍如此说，乃是从钟嵘的直接论述中推衍而来，反对用事中蕴含的对于知识的态度。陈衍按照钟嵘的论述逻辑推论，反对用事，就意味着反对博物，换句话说，就是反对诗人应该有广博的知识基础。这一命题的危害是误导人们“束书不观”。而与此相反，杜甫的命题则显然正面肯定了知识与诗歌之间的密切关联，强调博学对于诗人的必要性。钟嵘与杜甫的论述都在中国诗歌言志抒情传统的范围之内，代表了中国诗学思想传统的两种价值取向：一轻知识，一重知识。

从诗学思想史的角度言，可以说杜甫标志着中国诗歌史的知识转向。至韩愈出，倡言“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②，提出了道德与文章关系的命题，涵养道德遂成为文章的关键，而知识则是培养道德的基础。此一命题在宋代以降诗学中产生了深远

① 《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

② 《答李翱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影响。沿着杜甫、韩愈的命题,无论诗歌的审美方面还是道德方面都以知识为基础,这实质上正是苏、黄及江西诗派的诗歌观念基础。而韩愈的道德与文章关系的命题被理学家朝向极端道德化方向发展,出现了诗歌的义理化趋向,而义理化也就是把诗歌知识化。

知识与抒情的问题本是在中国诗歌抒情大传统内部的问题,但在宋代,知识的位置与作用越来越被强调与突出,甚至走到了抒情的对立面,有脱离抒情传统的趋势。正因为此,以江西诗派、理学家为代表的传统被从抒情传统区分出来,被视为与抒情传统相对立的知识传统。在南宋,当抒情传统受到严重挤压之际,诗坛也开始出现回归与重建抒情传统的趋向。“四灵”及江湖诗人掀起晚唐诗运动、严羽高举盛唐诗旗帜,都力图重建唐诗传统,而从诗学思想上说,就是重建抒情传统。

二、宋代诗学的知识转向及知识论述

依照刘克庄等人的论述,诗歌史上从唐到宋的转变,在诗学思想史意义上乃是从抒情为本到知识为本的转向。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知识性转向有两个脉络:一是思想史的,一是诗学史的。诗学史的转折在杜甫,思想史的转向在韩愈。韩愈“仁义之人,其言藹如”之说,提出道德与文学包括诗歌的关系,引出了作者的道德修养问题,而知识与道德修养的关系亦由此引出。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说,被解读为知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其影响后世者主要在诗歌及诗人的审美修养本身。以上两个脉络到宋代,尤其是在黄庭坚,便交汇在一起,既强调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道德是诗歌的根本,也强调知识是诗歌的审美基础,形成了中国诗学中的一套知识论述。诗人之道德与审美修养的核心是知识;作为诗歌内容的意与审美形式的辞都以知识为基础;诗歌作品的理解与诠释也建立在知识的

基础上。理学家强调诗歌的道德基础，强调诗歌的义理价值，而在程朱一派，道德修养也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可以说，从江西诗派到理学家，所涉及诗歌的知识问题是全面性的，知识成为诗歌的根本，借用刘克庄的话来说就是“以书为本”。

宋诗的知识化转向有复杂的原因，但从思想史背景看，与宋初以来的儒学复兴有密切的关系。论宋代儒学复兴者必上溯至韩愈。韩愈将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德言关系论引申到文学上，提出“仁义之人，其言藹如”的命题，开启了道德与文学的关系。他把德与言的关系比喻成木根与果实、膏油与光明的关系，提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强调了德对于言即文章的决定作用。这样对于一个文人来说，道德修养成为关键。韩愈说“养其根而实其叶，加其膏而希其光”，“养根”“加膏”强调的正是道德修养。道德是因，文章是果；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文章的高下；文章要做得好，关键要在道德上用力。这就是韩愈的命题所蕴含的思想理论意义。

黄庭坚上承韩愈有关道德与文章关系的论述，并且同样以木为喻。他说：“孝友忠信是此物（指诗歌）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①道德既然是诗歌的根本，那么对于诗人来说，培养道德也是根本。在黄庭坚看来，培养道德的途径是读书，也就是说，知识是道德的基础。培养道德，首要的是儒家经典，即所谓经术。经术提供了人生的准则，对人生具有指导意义：“经术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②在培养道德方面，历史知识仅次于经的地位。“探经术以致其深，考史传以致其博。”^③“致其深”是深求经中义理；“致其博”是博考历史经验。经史之间，应以经为主导。“凡读书法，要以经术为

① 《与洪驹父书六首》之一，《山谷外集》卷十。

② 《与潘子真书二首》之一，《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

③ 《与子智帖二》之二，《山谷别集》卷二十。